第 32 卷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2, No.1
Jan. 2002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计 翔 翔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17 – 18 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 1688 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 19 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早期汉学;中西文化交流;17 – 18 世纪史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2)01 – 0089 – 08

汉学是指从外部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化进行的研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加剧,研究西方汉学的意义日益突出,汉学成为"显学"的趋势也日益明朗。但是,学术界对汉学学术史的探讨,至今仍聚讼纷纭,学者们按照对"汉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提出了不同的分期说法①。

笔者认为,西方汉学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两大文明直接碰撞的产物。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以前,只能属于"前汉学"时期。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为"早期汉学"(或称古典汉学,也有人称为传统汉学)时期。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深入中国内地后,有的长期居于朝廷,有的广泛游历民间,对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中华典籍,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为 19 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或称发达汉学)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先期成果。

一

从 1583 年利玛窦(M. Ricci,1552 – 1610)和罗明坚(M. P. Ruggieri,1543 – 1607)在中国内地定居到 1688 年的 105 年间,为早期汉学的第一阶段。利玛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5],他的著作 1615 年在欧洲的出版,成为早期汉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收稿日期] 2000 – 06 – 30
[作者简介] 计翔翔(1950 –),男,浙江平湖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汉学史研究。

① 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大致按公元纪年的"世纪"标准将它分为七个阶段[1]。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分为五个时期:(1)希罗多德时代的终结——前中国观时期;(2)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初步认识中国时期;(3)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准中国观时期;(4)世界走向中国——从教士中国观到职业中国学时期;(5)走向专业化的中国学——从中国看中国的试图时期[2]。阎纯德在其《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中,则将汉学分为"萌芽时期(公元前后至 15 世纪)、初创时期(16 世纪至 18 世纪)、繁荣拓展时期(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及汉学的当代意识和发展趋势(20 世纪中叶以后)四大期[3]。张西平认为,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不同的阶段。"游记汉学"是西方汉学发展的胚胎时期,它的真正始点应是"传教士汉学"[4](p.342)。

(一)“适应”策略促成汉学诞生与发展

西方教会开始到中国传教时,遇到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耶稣会正确地确立了“适应”(Accommodation)策略:不急于追求接受皈依的信徒数量,而是选择一条沟通双方文化,减缓文化冲突与对立的道路,以达到成功传教的目的。正是这种策略,使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耶稣会士向世俗的文化使者迈出了一大步,这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者遂成为西方最早的汉学家。

实施“适应”策略的前提是学习汉语汉字。利玛窦去世后,尽管传教士内部对他制定的“适应”策略出现不同看法,但是,来华传教士必须精通汉语这一条却被坚持了下来。学习汉语导致研究汉语,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音韵、文字、语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钻研,撰写了有关论文,编著了双语字典。早期汉学在语言学方面的最高成就,是金尼阁(N. Trigault,1577 – 1628)为帮助来华传教士认读汉字而编著的《西儒耳目资》。清朝建立后,满族成为国家统治民族,学习满语的意义日益突出,南怀仁(F. Verbiest,1623 – 1688)编写的《鞑靼语基础》,成为来华传教士研习满语的优秀语法书。

与实施“适应”策略相应,入华耶稣会士的角色定位为西儒,造型为儒冠儒服,主要交往对象为中国儒生。欲在与儒生讨论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话题中,寻求儒家经典对基督教的支持,就必然要求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在儒生帮助下,来华传教士在研究儒家文献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了方便来华耶稣会士学习儒家典籍,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语并稍加注释。凡初来华的传教士必须据此研习[5](p.250)。金尼阁则将“五经”译为拉丁语作为初来华的传教士的读本。除利玛窦与金尼阁外,曾德昭(A. de Semedo, 1585 – 1658)也曾对欧洲人介绍了这些古籍的内容,尤其对“五经”有详细说明。安文思(G. de Magalhães,1609 – 1677)更撰有孔子书注,不仅翻译了儒家经典的某些段落,而且根据朱熹、张居正的诠释予以评注[6](p.102)。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释读和利用,为我们勾勒了一条早期汉学发展的轨迹。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多认为吾国古代之儒,与天主教实不谋而合,秦火以后,始渐失传;理学起,则并所传什之一二,亦失其真。”[7](p.49)这就是附儒传教的基础。《孟子》书中的有些观点,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成为纳妾堂而皇之的理由,传教士对孟子的著作一开始就持谨慎的回避态度。所以,在早期汉学第一阶段,传教士研究的主要是古儒学说,且以孔子学说为主。1687 年,柏应理(P. Couplet,1625 – 1692)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汉语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内中却没有《孟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适应”策略使来华传教士在学习中国古籍之余,惊讶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在接触中国社会时,深感其版图辽阔、物产丰饶,以及在非基督教国家中表现出来的极其良好的统治秩序、高尚的道德和淳朴的风俗。这一切都使早期汉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丰富起来。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等等很快成为汉学的传统项目。

当时,在欧洲还出现了一些对汉学感兴趣的学者,尤其是德国的基尔歇(A. Kircher)、门策尔(C. Mentzel)、缪勒(A. Muller)等。他们与入华耶稣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藉以研究的主要来源是来华传教士的书简、报告和著作。他们还不失时机地向回欧传教士咨询。在汉学研究方面,他们做的主要工作是将搜集到手的第二手资料整理加工,予以综合并发表评论。此间,他们实际上处于传教士汉学家附庸的地位,但又是后来职业汉学家的先驱,其作用不可低估。

在早期汉学的创立以及其第一阶段的迅速发展中,中国儒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这是汉学跟其他东方学的重大区别,也是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尚未给予应有重视的问题。

(二)中国儒生的重要作用

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与明末清初的儒生建立了密切关系[8]。这些入华耶稣会士所交游的儒生

中，有的皈依了基督教；有的虽未皈依，但对基督教抱有某种好感或对西方科技开始有了兴趣；也有的虽然反对基督教传入中国，但是愿意心平气和地与之“辩学”。这些儒生在不同层次上对提高入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修养作出了贡献。

笔者认为，中国儒生在客观上在通过两条途径培养了西方第一代汉学家。首先，是指导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钻研儒家典籍，掌握名物制度。其次是翻译。明末不少儒生有很强的翻译情结。徐光启大声疾呼：“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9](p.245)在翻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儒生进行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文化交流，这对传教士提高中国文化修养效果特别显著。通常的做法是，在译书前，双方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在对有关内容有了较深入了解的前提下，确定翻译选题。由于是异质文化的交流，“有迹之器，粗可指陈，无形之理，译猝难究竟”[10](p.299)，正式翻译时，就有必要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循序渐进：“乃先就诸有形之类，摘取形天土水气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创译焉。……然而精义妙道言下亦自可会，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11](pp.199－200)。当时的翻译主要采取传教士口译，中国儒生笔录，双方当面共同推敲的形式。这对传教士提高中国文化修养效果特别显著。译书的范围广泛，包括基督教理、天文历法、数学、哲学、工艺技术等等。数目也很可观。这一阶段是来华传教士用汉语著书译书的高潮时期。经南怀仁补订的《始 1581 年止 1681 年传教中国之耶稣会诸神甫名录》，著录用汉语编译书籍 236 种（不包括中国信教学者的著作）。这些数据只是翻译物化形式的计量；而翻译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在汉文化修养方面的提高则是无法计量的。

此外，中国儒生在某些场合还直接参与了西方早期汉学的一些学术活动。《西儒耳目资》就是中西方人士合作的产物。王徵等“二三同志”参照《洪武正韵》和《韵会小补》，为金尼阁提供了语言学材料，后者按西方语音学来探讨汉语音韵规律，双方共同进行整理[12]。而在早期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开端的研究中，中国儒生的意见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突发性事件的影响

首先是天文历法领域的三大事件。明代历法虽称“大统历”，但实际上沿用元代“授时历”。时间一长，误差加大。崇祯二年（1629），奉旨修改历法。先后由大学士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光禄寺卿李天经等与西洋人汤若望（J. A. S. von Bell，1591－1668）等在历局编译，撰成《崇祯历书》100 卷。期间，来华传教士广泛了解了我国天文学和数学现状，观看了中国原有天文仪器和天文台的设施，为西方汉学的天文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入清以后，汤若望获清世祖重用。自顺治元年（1644）起，传教士得以入主钦天监，直到 19 世纪初[13](p.760)。中国天文学原有的一切资料遂得为传教士所用。康熙初年，历狱发生。南怀仁等为自我辩护，深入钻研旧历法，攻击其薄弱环节。他所撰的《不得已辨》就包含了对中国旧天文学的考察，特别是对其缺陷的针砭，深得关节。早期汉学的天文学部分相对早熟，并不是偶然的。

更大的事件发生在政治领域。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兵入关导致了明清易代。中央王朝暂时失去控制，使在华传教士一时间具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深入民间，把以前专注于上流社会的目光移向社会中下层。在了解民众，观察民俗、民风方面，取得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他们全面研究中国提供了可能。更能开阔入华传教士视野的是，他们居住在中国各地，在政治大变动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北京的汤若望首先托庇于新生的清王朝；南方的一些传教士则效忠于南明王朝，卜弥格（M. Borm，1612－1659）曾奉使罗马教廷；在西南的利类思（L. Buglio，1606－1682）、安文思等人则活动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居于东南的卫匡国（M. Martini，1614－1661）；“因鞑靼侵略，内乱，不忘旧主者之举义兵，地方不靖，未能久居一地”，游历颇广[14](p.261)。从总体上看，这是传教士在华经历最丰富的时期，对于早期汉学有关地理、语言学（尤其是方言）、民情风俗、当代

历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四)对第一阶段的评价

对早期汉学的评价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两个不足。

首先是对整个第一阶段的评价不足。由此导致汉学产生于法国的错觉。事实上,早期汉学具有起点高、发展快的特点。它除了与中国儒生的特殊作用有关外,也与传教士自身的素质有关。在最初的汉学家中,除闵明我(D. F. Navarrete,1619 – 1689)、利安当(M. Caballera,1602 – 1669)等个别人外,大抵为来华耶稣会士,其中不少人受到文艺复兴的熏陶。据学者们研究,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教士在本质上都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能够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宗教神灵启示的精华和非凡的科学知识以及能力综合于一身。即使按现代的标准来看,他们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放思想。对异教文明的尊重和利用态度,使他们把中国社会与希腊 – 拉丁及基督教的西方在一切领域传统之间的异同,作为特别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早期汉学第一阶段的成就为第二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入华传教士编写字典(包括读音字典和释义字典)和语法书,研究历史与地理,探讨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翻译古代典籍,介绍学术思想,构筑了汉学的基本框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此后,新入华的传教士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成果取得新的成就,再也不用像他们的先行者那样,需要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重新摸索。而不懂汉语的、未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也有可能研究中国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在回顾 17 – 18 世纪已发表的汉学著作时指出:"对于年代久远、物类繁杂、内容丰富的伟大中国文化,这几位开创者已经踏出了一条大道,可使后继者在广阔的疆域上,一眼就能看得到探索的方向。"[15](p.42)中华民族在五千年中创造的绚丽文化,早期耶稣会传教士通过百年的辛勤劳动,大致地把它介绍给了西方。

其次是对葡萄牙籍传教士们在早期汉学中的贡献估计不足。耶稣会作为一个宗教修会,它具有国际特征。但那些教士汉学家毕竟还是有国籍的。学者们也常常按国别评价他们。汉学家戴密微认为:"利玛窦的大名,迫使我必须对意大利传教士们讲几句话。他们于 16 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汉学家们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16](p.4)似乎早期汉学的第一阶段,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王漪通过量化分析指出,从国籍看,这时的分布尚均匀,葡人著作占 36.5%(第一),意人著作占 30.7%(第二)。但进一步分析,意籍远胜于葡籍:意籍教士中 45.7%有汉学方面的著作,葡籍仅 29%[17](p.61)。笔者认为,量化分析固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然而有时历史的真相未必是几个数字所能全面揭示的。要得出正确结论,恐怕还不能不看当时杰出汉学家的人数以及他们的著作所达到的水平。戴密微只列举了 3 个意大利人(利玛窦、龙华民和卫匡国)以及 1 个佛拉芒人(金尼阁)[18](pp.162 – 185),葡萄牙人没有一席之地。王漪也只列举了 2 个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卫匡国),2 个西班牙人(高母羡和 D. F. Navarrete),同样不理睬葡籍著名汉学家曾德昭和安文思[17]。这样的结论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正是曾德昭、安文思等人为汉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这一时期的葡萄牙挣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这种地位是与葡萄牙在早期扩张(伊比利亚的扩张)史上的作用相称的。

葡萄牙传教士在早期汉学第一阶段扮演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汉学家对中国崇敬、歌颂的基本态度。葡萄牙是西欧的小国,虽然地理大发现后国势处于上升阶段,但与当时的中国相比,差距显而易见。对中国的褒扬、对欧洲的自惭形秽始终是曾德昭和安文思们著作的主旋律。

二

1688 年在早期汉学史上具有象征意义。1 月 28 日,南怀仁去世,宣告了天主教早期在华传教

史上“英雄时代”(利玛窦 - 汤若望 - 南怀仁)的终结。2 月 8 日,洪若翰(J. de Fontaney,1643 - 1710)、张诚(J.F. Gerbillon,1654 - 1707)、李明(L.D. Le Comte,1665 - 1728)、刘应(C. de Visdelou,1656 - 1737)和白晋(J. Bouvet,1656 - 1730)等五位法国传教士到达北京[19](p.60)。他们的到来和南怀仁的去世,形成了对葡萄牙行使在华保教权的强烈冲击。

也在这一年,安文思的汉学著作经法国人整理翻译,首先在巴黎用法语出版。由于该著作在汉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它成为早期汉学第一阶段回顾和转入第二阶段前奏的象征。

从 1688 年到 1793 年的又一个 105 年,为早期汉学的第二阶段。法国入华传教士在充分利用早期汉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促进了研究范围之扩大和研究层次之深化。在这个意义上,利奇温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法国在对华贸易的发展方面仅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媒介却具有宏伟的影响”[20](p.15)。

(一) 传教士兼“国王数学家”的东来

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48 - 1715 在位)宣称为“神权国王”,奉行法国教会的独立自主政策,恢复高卢教会(Gallican Churches)的旧仪式,并把专制统治推向了顶点。在为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同时,他还积极向海外发展,并力图结束葡萄牙在远东传教的垄断地位。

当时,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G. D. Cassini,1625 - 1712)向首相柯尔柏(M. de Colbert,1619 - 1683)建议派遣耶稣会士到东方进行天文观测,并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这正中这位重商主义政策最著名的倡导者的下怀。路易十四与法国耶稣会长达成共识:“国家的利益和宗教与科学的利益是分不开的。”[15](p.30)被派赴来华的耶稣会士均学识渊博,又具有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为避免和葡萄牙“保教权”冲突,他们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待遇极其优厚,不仅得到了科学器材、礼品和养老金,还被接纳为法国王家科学院成员。除宗教使命外,他们还有一个纯科学的目的,即为了欧洲的利益透彻地考察中国。“这时宗教和科学之间已经相互作出妥协;我们的整个古代汉学就带有这种特性”[21](p.3)。此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跟别国的传教士一概由教会派遣不同,由法王所派。当法国政府决定将由学者而不是由商人在中国作为自己的代表时,法国的汉学研究成为欧洲的中心也就被决定了。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汉学研究选题的主要取向是“有趣而有益”(curious and beneficiall)[22],那么,这一阶段则更重视追求科学利益。1684 年,法国王家科学院列出的有关中国调查的清单,几乎包罗万象[23](pp.502 - 504)。

早期汉学第二阶段研究的世俗动机增强,还与当时欧洲尤其是法国社会的变化有关。其一是缘于启蒙运动的发展。启蒙思想家为了论证和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社会改造方案,需要中国材料。他们不是汉学家,但在中国报道和研究中热切地各取所需。他们的著作又引起了许多读者对中国的兴趣。不少人急于探究启蒙思想家所说是真是假,不同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对立的评价孰是孰非。其二是中国热的兴起。中国的漆、瓷、刺绣、图案都成为最时尚之物。中国热又反过来推动汉学发展。当时很多欧洲人对中国深为关心,相信入华耶稣会士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利用跟来华耶稣会士的通信或乘入华耶稣会士返欧之机,提出各种问题,促使在华传教士的研究不断深入。

(二)“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

17 世纪 90 年代起,“礼仪之争”进入高潮。被教皇任命为驻福建宗座代牧的巴黎外方传教士严珰(C. Maigrot,1652 - 1730),公然发表反对耶稣会士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的七条训示(包括严格禁止祭祖敬孔),责令他所管辖的传教士一律遵行。严昉还将该文件发往欧洲。教廷于 1697 年下令圣职部重新审理中国礼仪问题。

1700 年,毕嘉(J. - D. Gabiani,1623 - 1696)为利玛窦观点辩护的《中国礼仪问题之辩论》在列日

出版。次年,龙华民揭示基督教与孔子观念之间差异的《孔夫子及其教理》被译成法语《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在巴黎出版。同时问世的还有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的《论中国传教区的某些重要问题》。巴黎大学贬斥了引自耶稣会士李明和郭弼恩(Le Gobien,1653 – 1708)著作的 6 条建议。

礼仪之争从宗教的角度看,自是以耶稣会的失败告终。但它极大地促进了汉学的发展。尽管由于是大论战,论辩双方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有意曲解和无心误解,但是论战毕竟要求人搜罗证据。论辩双方都从中国古代文献切入,引经据典的作品很多,大部分是关于《礼记》的研究,这就又一次兴起钻研中国传统学问的高潮。但从总体上说,这次研究主要关心的并非中国经典本身,而是经典语句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这就导致对中国儒生和广大民众进行广泛调查[24](pp.137 – 238)。对中国的风俗民情研究遂取得突破性进展。传教士们撰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论著,也引起欧洲民众对中国的关注。赴华耶稣会士在巴黎的代理人郭弼恩及其后继者采取巧妙手法,自 1702 年起,陆续将入华耶稣会士寄回的书简结集出版(《耶稣会士书简集》)。法王路易十四忏悔神甫的秘书杜赫德(J. B. du Halde)利用接手编辑的机会,编写《中华帝国全志》。两者成为 18 世纪西方汉学的奠基工程。因此,从不同思想直接交锋的剧烈程度,从各种有关著作的大量出版来看,中国礼仪之争的主战场在法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早期汉学第二阶段法国中心的地位。

(三) 中国统治者的利用政策

清前期统治者对入华耶稣会士主要实行利用政策,让他们参与了众多的世俗活动。张诚、安多(A. Thomas,1644 – 1709)等用满语给康熙帝讲授欧几里得几何学。德理格(T. Pedrini,1670 – 1746)给皇三子等每日讲授音乐。白晋、张诚在宫廷中建立化学实验室研制药品。在军事方面,传教士还向清廷提供了大炮。在外交方面,传教士参与清政府跟俄国的谈判;康熙帝还派艾逊爵(字若瑟,A. F. J. Provana,1662 – 1720)去罗马教廷协商解决礼仪之争。通过这些活动,有关传教士有效地了解了中国数学、音乐、医学医药、军事和外交的现状乃至历史。

对这一时期汉学发展影响最大之举,是康熙帝在巴多明(D. Parennin,1665 – 1741)等人的建议下,同意采用西法测绘全国地图。测绘工作主要由传教士担任,最后由杜德美(P. Jartoux,1668 – 1720)汇总编制《皇舆全览图》。乾隆时,在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后,先后两次测绘天山南北路。测绘工作虽由清政府官员负责,但蒋友仁(M. Benoit,1715 – 1774)等传教士仍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内府舆图》最后由他编绘而成。

传教士们这两次全国性大考察,都是在当朝君主命令下进行的政府行为。各地官府提供了极大便利。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经过深入的科学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西方汉学的发展得到了极其难能可贵的机会。18 世纪中期,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J. B. d 'Anville)据在华传教士寄去的《皇舆全览图》副本绘成《中国新地图》,在欧洲广为流传。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用西法测绘对我国近代地图学建立和发展的影响,而不论及其对西方汉学的作用,其实极不全面。在某种意义上,它对西方汉学的影响更大。一个主权国家请外国人实行如此大的考察,实在是绝无仅有之事。

(四) 本阶段汉学的特点

本阶段的汉学研究在传统领域上有了深化。在中国古籍研究方面,入华传教士冲破了利玛窦独尊孔子的传统。他们在早期汉学第一阶段主要研究孔子著作的基础上,还研究近儒的诠释,甚至非儒家著作。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卫方济(F. Noël,1651 – 1729)在布拉格大学出版的拉丁语版《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不仅译本文,而且选译注释,"得谓孔子与孔门诸子之说,翻译较为完备者,诚无过于是编"[14](p.420)。

更重要的是,本阶段汉学研究开拓了不少新领域。尤其在科学技术的深入调查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就。杜德美以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人参(gin - seng)的药理作用[25](v.10,pp.71 - 81),殷弘绪(d'Entrecolles,1662 - 1741)对中国用鼻吸法种痘预防天花作了大量调查[25](v.11,pp.342 - 361)。其他一些耶稣会士也掌握了与中国有关的接种的详细材料。钱德明收集了不少有关养身学的资料,其中包括中国传统的"功夫"。巴多明摘译了中国法医学专著《洗冤录》。在冯秉正(M.de Maillac,1669 - 1748)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有关中医、中药的论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此外,中国教徒高类思和杨德望还应贝尔坦(H. Bertin,1722 - 1792)的要求,多次向法国邮寄中草药。

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对新领域开拓最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范围突破了中国中原汉民族的传统,对周边区域,尤其是对新疆以及蒙古、满洲等地区和鞑靼语言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有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之称的《中华帝国全志》,其全称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26]。

本阶段汉学在对中国的态度方面也略有变化。作为从欧洲大国法国前来的耶稣会士,常常将中国与自己的祖国相比较,抱有一种双方平起平坐、各有特色之感,因此,从一开始就说了中国的好话,但也说了中国的坏话。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既不应该被全盘赞扬,也不应该遭全盘谴责[27](pp.320 - 324)。

(五) 早期汉学的终结

1793 年在早期汉学史上又可以被看作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一年。在汉学中心的法国,这年 1 月,路易十六(Louis Ⅹ Ⅵ,1774 - 1792 在位)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来华传教士彻底失去了波旁王室的支持。同年 5 月至 6 月之交,激进的吉伦特派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既使得已进行了 4 年的大革命走向最高潮,也使得包括汉学在内的非"革命文化"受到更大打击,负责与在华传教士联络的法国王家科学院之名也被取消。

在中国北京,被称为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之一的钱德明,在获悉法王被处死的消息后,悲哀不已,中风而亡。三大家中另外两人是马若瑟(J. - H. - M.de Prémare,1666 - 1735)和宋君荣(A. Gaubil,1689 - 1759)。前者之"中国文学,非当时之同辈与其他欧洲人所能及"[14](p.528);后者的"严谨的翻译和历史研究在同事中堪称典范,而且可以说奠定了法国汉学精密传统的基础"[27](p.63)。学术界对钱德明的评价则是"通满、汉文,精审与宋君荣相伯仲,而渊博则过之"[28](p.85)。他的逝世,宣告了以传教士为主力的早期汉学的终结。

同年,英国马戛尔尼(G.Lord Macartney,1737 - 1806)使团抵华。双方为礼节问题发生争执。乾隆帝拒绝了英方在华贸易等要求。但使团人员通过实地考察及同清朝官员谈话,搜集到种种情报,撰写了见闻录,得出清政府貌似强大,其实腐朽衰弱,在许多方面已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结论。中西方国力对比的变化,预示着西方新汉学将对中国的基本态度作出调整。随着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对走向封建末世的中国的研究,19 世纪的汉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更多的殖民主义色彩。

[参　考　文　献]

[1]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出版社 1949 年版影印),1989.
[2]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3] 阎纯德.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A].阎纯德.汉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4] 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二、三卷[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5] D.E.Mungello(孟德卫).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M].Stuttgart:Steiner-Verlag-Wiesbaden-Gmbh,1985.
[6] G.de Magalhães.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particularitez les plus considerables de ce grand Empire[M].Paris:Chez Claude Barbin,1688.

[7] 方豪.影印《儒教实义》序[A].吴相湘.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Z].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8]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9]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A].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A].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李之藻.译《寰有诠》序[A].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李之勤.王徵遗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3]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5] 阎守诚.阎宗临史学文集[C].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16] 戴仁主.法国当代中国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 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18] 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A].安田朴,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C].成都:巴蜀书社,1993.
[19] Louis Le Comte. Un Jésuite à Pékin,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 – 1692[M]. Paris: Phébus, 1990.
[20]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1]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A].阎纯德.汉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22] A. Semmed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M]. London. 1655.
[23]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4]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5] J. B. Du Halde.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Z]. Lyon, 1819.
[26] J. B.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Z]. La Hare, 1736.
[27]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28]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 徐 枫]

A Stud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Sinology in the West

JI Xiang-x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inology in the West is an immediate product of the culture clash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ever since the great era of Geographic Discovery, with its keynote varying with the changing importance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onstituted the early period of Sinology. Missionaries to China, especially those Jesuits, immersed themselve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us had a fairly deep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society, by means of either staying at the court or going to the grassroots.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scholars, they studied many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and therefore presented the study of Sinology with a high starting point. They prepared handsome raw materials for the full – fledged Sinology in and aft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many books serving various functions, laid foundation of the field of Sinology, and scored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the early researches.

Key words: early period of Sinology;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of 17th-18th centuries